

《論竺道生從毘曇到般若的轉向》

謝獻誼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本論文主要探究竺道生思想中毘曇學闕如的現象問題，尤其側重於竺道生曾經積久學習毘曇之學，卻為何在其後來的論著當中難以尋見此般毘曇學的影響及痕跡。換言之，做為晉宋時期影響中國佛學轉向的關鍵人物，該如何看待竺道生在學思經歷與其學說思想間的不平衡問題，這包含著毘曇學對竺道生思想的影響為何？為何在道生現存思想、言說中難以尋見顯著的影響痕跡？又，如果他真的揚棄了曾經深習的毘曇學，其原因何在？

另一方面，現今對竺道生思想的研究，多數側重於他的般若性空觀、頓悟說以及佛性論等，而在加入毘曇學的討論後，能否循此對竺道生之思想有著更深入的發微？而在補白竺道生思想中關於毘曇學的容受問題後，又是否能對於竺道生思想有著更為整全、確當的認識。同時，在回歸中國佛學發展的脈絡底下，更對於早期中國佛教毘曇和般若、甚至擴及大、小乘間的交涉過程、細節及其相關問題等，提供一個合理的觀察與說解。職是，本論文訂以「論竺道生從毘曇到般若的轉向」為題，期望透過此一論題設定與後續論述開展，能對前述議題提供相應之合理解釋。

而有關本論文的研究材料，雖竺道生在世時著述甚豐，共有大、小論著（含書信往返）約計十餘篇，惜多數均已佚失、難以尋見全貌。而在《出三藏記集》中所記載、由道生撰著的《維摩詰經義疏》、《法華經疏》、《泥洹經義疏》，目前則保存於《大正藏》所收錄的《注維摩詰經》、《法華經疏》與《大般涅槃經集解》三部典籍當中，故本論文將全面採用其中保存的道生言論資料進行分析之外，其他後代述錄竺道生思想言說的文獻資料，例如謝靈運的《辨宗論》、慧達的《肇論疏》等，凡有助於釐清、掌握竺道生思想者，本論文亦將酌加取用。

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於本論文涉及毘曇學理論與竺道生思想、學說內容的

釐清、掌握，進一步更擴及兩造間思想內容的比較、分析，而其研究基礎又取決於考訂竺道生與毘曇學的接觸關係等，凡此皆有賴於對文獻資料的充分閱覽、理解與析論，故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文獻分析法」為名，此係以閱讀竺道生著作與相關史傳、經錄等文獻為根柢，進一步展開對於文獻的解讀、分析、比較等各個研究步驟；其實際運用於文本處理時，又可分為以下數個層面：一、對象問題的釐定。二、內在結構的重組。三、理論內容的比較。換言之，本論文係採取思想比較的進路，即透過選取毘曇學和竺道生思想中具代表性之論點，再運用分析、比較之方法，逐步釐清毘曇學在竺道生思想中所佔有的份量，以及竺道生對待毘曇學的立場、觀感等。

而在實際論述方面，本論文的結構進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次首將敘明研究動機的發起，以及論題設定的意義。其次，回顧與此論題相關的前行研究成果，一方面確實掌握此前相關研究所完成的部分，其研究貢獻與觸及範圍為何，是否仍有值得再行發掘之處；另一方面則是立足於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用以劃定及突顯本論文的在竺道生思想研究方面的開拓範圍及其價值。接著，則是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及在此範圍設定下相關的研究材料為何。最後，說明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的運用，並具體擬定論述開展的章節進程。

第二章 竺道生與毘曇學的關係

第二章隸屬本論文的研究基礎。由於本論文主要探討竺道生思想中般若學與毘曇學交涉的問題，故說明竺道生與毘曇學關係，便是本論文首應著力之處。首先，本章次擬先就中國早期毘曇文獻的翻譯與傳播、容受狀況作概要說明，其用意在於呈顯、了解竺道生以前中國毘曇學的發展情形。其次，針對史傳等載錄竺道生生平遊學事跡與毘曇學接觸

的史實進行考訂，其中包含竺道生接觸毘曇學的年份、地點、授予毘曇學的對象等各種細節。最後，具體論證竺道生所接觸到的毘曇學理論為何，用以釐清竺道生在各種部派毘曇學系統中的接受對象，始能明確地與後文論述般若學與毘曇學交涉的部分有所接應。

第三章 法體論之比較：毘曇「法體」與竺道生「理」的比較

第三章以降，主要以思想、理論比較的方式進行。在本章次開始，首先針對竺道生所接觸的毘曇學理論進行析論，主要集中在毘曇學對於「法體恆存」和「三世實有」理論的探討，其間包含毘曇學如何定義「法體」的內涵，以及由此導出「法體實有」的理路。其次，針對竺道生思想中位居核心地位的「理」概念進行考論，嘗試分析竺道生「理」概念的內涵，包含其中的觀念架構和理路推演，以及「理」概念的形成背景和基礎成分等，同時亦就竺道生言論中與「理」概念相關的其他理論內容，像是法身、悟理等概念進行延伸性的說明，以求能完整掌握道生「理」概念的特殊意義。第三部分則具體比較毘曇學「法體恆存」理論與竺道生「理」之概念在學說理論上的異同，並嘗試釐清二者間是否具有可架接或可融通之處，其間的轉圜點為何，轉出後的「理」概念是否有超越或不同於「法體實有」理論的部分，同時也觀察在道生身上當毘曇學遇到般若學時，他是否全盤的接受般若並放棄毘曇等關鍵問題。

第四章 修道論之比較：毘曇「漸修頓斷」與竺道生「漸修頓悟」說的比較

第四章主要進行關於修道理論的考論。由於上一章次已然確立對於法體內容的界定，而法體內涵的提出，最終仍回歸、落實於修行者的體證，故順此理路而進行修道論的比較。首先，將析論毘曇學中的修道理論，主要側重討論毘曇學中有關「漸修」與「頓斷」的關係，其中包含毘曇學對於修行次第、所斷煩惱、斷煩惱之智慧以及最終獲證果位等細節的分析。其次，論究竺道生思想中另一有關修道的核心議題——「頓悟」說，嘗試解讀竺道生「頓悟」說的內容，例如「頓」的意義指向、「悟」與「理」的關係、如何界定「頓悟」的標準、「頓悟」是否與「漸修」形成背反、相違等，同時亦針對與「頓悟」說相關的修行觀點，像是道生所認為障礙修行的主要煩惱為何、斷除煩惱所具備的智慧為何，以及其他有關修行過程的重要原則等，均在

第二部分進行考論，以求能整全地發見竺道生對於修道理論的觀點。最後，專就毘曇學「漸修頓斷」理論與竺道生「頓悟」說的內容進行比對，討論其間是否有類同或相異之處，又該如何看待這些異同的部分。

第五章 業報論之比較：毘曇「待緣相續」與竺道生「善不受報」說的比較

第五章在比較、討論完法體與修道的理論後，由於凡夫修行至最終獲得成佛果位，並非一蹴可成，因此在不斷向上、向善的還滅過程中，便涉及界定善惡業報的發生及其可能造成的影響等，故須辨析業報論的層面。而由業報論衍生之問題係為「誰」來受報，故延伸之討論便觸及對眾生主體性解釋的意見差別。在實際論述上，本章仍先考察毘曇學對於業報理論的看法，箇中包含諸如「業」、「報」、「果」等個別概念定義及其種類區分，並且關注毘曇學談論業報的核心訴求為何。接著，則將集中於「業力相續」的討論；這涉及毘曇學認為業力如何延續的問題，並且擴及對眾生主體性的看法，同時亦將循此論究毘曇學在「無我」原則的堅持下如何維繫業感緣起的生發。此外，本章亦將擴及《三法度論》和犢子部立「不可說我」的內容，此係因道生很可能曾從僧伽提婆接觸到此種對眾生主體性問題的特殊意見。第二部分將考論竺道生的「善不受報」說；表面上「善不受報」似乎違逆於毘曇學承許業報存在的概念，但其實竺道生並非否認行善造惡等果報的因果鏈結關係，而是另有他所欲強調的、關於業報的看法，此係為本章次亟欲釐清的重點，故第二部分將以「善不受報」為主題線索，同時討論竺道生有關業報說的其他觀點，例如眾生未成佛前的行善造惡問題。第三部分，則比較毘曇學與竺道生對因果業報的看法、界說等，同時亦涉及二者對眾生主體性問題的立場；而究竟兩造理論間是否具有共通或迥異之處，又該如何解釋、看待道生對於業報的立場，以上悉是本章主力處理的部分。

第六章 結論

最後章次為結論，係總結前述五個章次內容的研究所得，並嘗試解釋竺道生思想中毘曇學與般若學兩者的交涉，在理論融通方面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內在理論銜接的問題。其次，由竺道生思想的事例，嘗試說明中國在晉宋時代由般若學轉向涅槃學之前，毘曇學對於當時佛學思想的影響，包含理論間的可能

銜接點、學說內容的去取抉擇等，以求能在回歸中國佛學的總體脈絡底下，補充中國早期佛學思想發展與轉向的可能原因。

以下，則概述本論文在研究成果上的兩大觀察。

一、竺道生思想中毘曇學空白現象之解釋

經以上進程設定及考論後發現，關於竺道生身上般若與毘曇之交涉實情，是他以般若學理為其思想基底，復在此上融會、貫通各類大乘經典，並且在會通各種大乘思想的過程中，亦對毘曇之學做出裁定與選擇。換句話說，竺道生思想中般若與毘曇之交涉現象，其實衍生的是他如何面對和處理大、小乘間教理取舍、定位等相關問題。而以道生為例，般若所反映的大乘空義思潮與毘曇所代表的部派佛學系統，對道生而言，最終他是擇選以般若等大乘經典為其思想歸向，也因此在他自覺地檢討、修正毘曇學問題時，遂體現出其思想形成毘曇學空白、闕如之現象。

二、由竺道生之例探視中國佛學以佛性思想為特徵之發展

進一步來說，當道生在會通大乘思想並以之面對既往的毘曇學時，他亦不僅擇取單一大乘經典或只限定於像是般若空義等特定思想，而是綜貫他一生曾接觸到的三種大乘經義——般若、法華及涅槃，並且以融會貫通的立場、方式加以重組、再建，最終體現為他以般若空義為基底而提出「理」之概念，復由「理」接軌於《法華經》「一乘」的立場，最後又由「理」連結至佛性意義的解釋。本此可說，竺道生對於中國佛學最為顯著的影響，即是自此確立以涅槃佛性為主流的佛學走向，這不僅主導著南北朝佛學的發展，甚至可說對佛性義理的闡發自此成為中國佛學的重要特徵。而確立此一佛學動向的先導者，自非道生莫屬。

此外，倘若再結合竺道生受習毘曇之事實來看，可以發現饒富趣味的現象。首先，道生在廬山學習毘曇有七年之久，而在長安依止鳩摩羅什則約三、四年，至於最後接觸《涅槃經》則僅一、二年之間。然而，最初且浸淫最久的毘曇之學最後卻是被道生用後來的般若空義與涅槃佛性論加以解構、修正，並且其思想特色係以般若空義為基底，而以涅槃佛性為頂點。換言之，在事實面與思想面的對應性上，就道生而言的確不合於比例原則，但與其將之視為「久學毘曇事實」與「毘曇思想空白」間的失衡現

象外，不如說雖然道生在思想面上最終揚棄毘曇且以般若通向佛性為歸宿，但這種由般若通往佛性的會通基礎，還是立足於毘曇之上而得以完成者。何以言之？以印度佛學歷史之發展脈絡來看，係由小乘轉為大乘，再從大乘中分出前期如《般若經》、《法華經》，以及大乘中後期之《涅槃經》。換言之，印度佛學的發展歷程具有著順序性及依循相關背景脈絡逐步開展而來，並且後期思想之形成，均是奠基於前行教義的基礎上加以轉化、延伸而成。但這種漸次發展、層遞累進的佛學歷史背景，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未知的斷層，所以早期的中國佛學發展，迺是隨著來華僧侶本身的學養、經歷，和其所譯出的經典而改變。幸運的是竺道生的學思歷程恰好順應於印度佛學的發展脈絡，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般若空義的原理、方法，並以之對毘曇學進行思考、消解，然後復由般若學連接至涅槃佛性教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講求「慧解」的研究特長，另一方面則透顯出道生本身學養的深厚基礎及其特殊性。然而竺道生能夠會通毘曇、般若與涅槃的基礎不能不歸功於對毘曇的深厚理解。準此，當說竺道生思想以般若學為顯著特色、而以佛性義為最終歸向的同時，其間不可忽略者係是做為基層的毘曇學；正因為具備深厚、踏實的阿毗達摩基礎，道生才能在其上快速融會般若空理，然後串聯於佛性教說，並以之做為思想定位的終點。

總上而言，竺道生賦予此後南北朝甚至是整體中國佛學發展的最大影響，在於確立起以涅槃佛性義理為導向的主流趨勢。然而，此一趨勢的形成亦與其學思歷程密切相關，甚至可說正是因為道生具有深厚且由「部派阿毗達摩→般若經→法華經→涅槃經」的循序基底，所以才能在其上開結出以涅槃佛性為代表的思想取向，而這一切的根源自不脫離於毘曇之學。

關鍵詞：竺道生，般若，毘曇，理，大乘